



No. 2003

Working Paper

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 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周颖刚 蒙丽娜 林雪萍

【摘 要】 随着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中国逐渐释放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城市包容性，特别是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探究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更高的城市包容性也对创业层次有正向影响，而城市外部环境条件和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对城市包容性影响创业决策有不同的调节效应。这些发现为我国城市制度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关 键 词】 城市包容性；流动人口；创业

【文章编号】 IMI Working Paper No.2003



微博·Weibo



微信·WeChat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 国际货币网

<http://www.imi.org.cn/>

1937

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周颖刚¹ 蒙莉娜² 林雪萍³

【摘要】随着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中国逐渐释放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城市包容性，特别是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探究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更高的城市包容性也对创业层次有正向影响，而城市外部环境条件和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对城市包容性影响创业决策有不同的调节效应。这些发现为我国城市制度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关键词】城市包容性；流动人口；创业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体制改革拆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不断释放了人口红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蔡昉，2017），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世界工厂的逐渐饱和，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创新与创业。2015 年 6 月，国务院

¹周颖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²蒙莉娜（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³林雪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双学士

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能够扩大就业、实现富民，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创业活动不仅仅从宏观层面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Glaeser 等，2015；李宏彬等，2009），还从微观层面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创新机会，提高个体收入（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在产业结构转型的“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创业活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包容是发展的前提。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主体的制度约束使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到流入地城市，降低了劳动力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就业的意愿（杨菊华，2015），也降低了其创业选择（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2010 年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及其附着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例如推行工作居住证制度⁴，试图通过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的包容性，以此来吸引人才，促进创业。同年 9 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⁵。2019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强调了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实现人口市民化等重点任务。可见，包容性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必然趋势。

城市包容性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多种维度的均等性和公平性。对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城市对他们的包容程度则会对其生产生活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就创业行为决策来说，当他们在一个城市能够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的满足感时，他们或许会更倾向于选择创业，以追求更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罗明忠和邹佳瑜，2011）。但是，现有文献多从户籍制度或者政府管制等单一维度衡量城市包容性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关注总体包容性的文献较少。那么，多维度的城市包容性的

⁴ 见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0]15 号）

⁵ 2010 年 9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讲话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48954.html>）

提高是否会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呢？对于拥有较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创业者，多维度的城市包容性是否会提高其创业层次呢？这些问题在已有文献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估。

鉴于此，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简称 CMDS），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并探究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视角。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城市的制度创新、特别是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吸引劳动力创业，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提高城市包容性，使城市发展的成果由新老市民共享也是中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之一。本文创新性地将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

第二，新维度。本文对城市包容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微观数据从个人层面构建了城市包容性综合指标。城市包容性的概念是随着“包容性增长”而逐渐兴起的，但是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不多，且多从城市层面进行定义（Florida 和 Gates, 2003; Qian, 2013; 李叶妍, 2017）。对于劳动力来说，在进行创业行为决策时候，劳动力更多考虑的是个体层面所能够获得的制度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因此，本文从个体层面构建的城市包容性指标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创新。

第三，新结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包容性能够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而高市场化水平降低了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对城市包容性所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可以更自主创业；高信息化水平降低了交易水平，从而促进了创业活动。流动人口的异质性也会对其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高家庭财富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了创业者对城市包容性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但是城市包容性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对不同学历的劳动力群体没有显著差异。这些

结论为我国城市创新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变量与实证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城市外部环境和个体异质性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决策影响的调节效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城市包容性概念的梳理

一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包容程度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生产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由于城市包容性的概念于近年才兴起，因此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Florida 和 Gates（2003）认为城市包容性代表的是对各少数、各种族和各行各业群体的开放性、宽容性和多样性。他们用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艺术家数量和外国人口出生指数之和构建的综合多样性指数衡量城市包容性。Qian（2013）在 Florida 和 Gates（2003）的研究基础上，采用同性恋人口和艺术家数量来衡量城市包容性。郑杭生和陆益龙（2011）认为开放、包容的城市应向所有居住人口提供统一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管理与服务，以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包括“居住权、劳动权益、享用基本公共品的权益、子女受教育权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权益。”张明斗和王雅莉（2016）将城市包容性发展定义为以机会均等性和过程公平性为实现要求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与城市包容性相似的概念还有社会融合和包容性增长。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流动人口在所居住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会对其生产生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任远和郭民乐（2006）将社会融合定义为迁入人口与迁入地文化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的过程。

包容性增长包含着城市包容性的一些价值追求，如发展成果共享和对机会公平性的追求；而城市包容性与社会融合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包容性基于城市角度，社会融合

则是从流动人口或者说外来人口的视角出发，城市包容性越高，社会融入水平越高。通过对城市包容性、包容性发展和社会融合这三个概念的梳理，可以构建出对城市包容性较为全面的认识，可知城市包容性包含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

（二）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选择

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是其促进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效途径。虽然国内外关于城市包容性对创业的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对于创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乏涉及城市包容性的内容。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家庭的“风险平滑效应”上。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发现，流动人口享受本地政府提供的就业、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和保障房等公共服务，可以降低流动人口的移民风险，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风险承受能力。周广肃和李力行（2016）发现，新农保会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其中一个可能的作用机制是新农保为农村家庭提供了风险分担功能，使得农村家庭可能在生产经营方面承担更多的风险，参与创业活动。这些研究分别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城市包容性的一个维度。其次，在宏观层面，城市的提供的越多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城市的包容性越高，其吸引人才的能力越强（周颖刚等，2019）。Qian（2013）认为，城市包容性能够降低城市进入门槛，吸引精英的创新创业行为。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子女入学，住房保障以及医疗养老保险等；城市的包容性越高，对流动人口提供越等同于“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创业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了城市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因此，基于以上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 1：城市包容性越高，流动人口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越高。

从企业成长发展和创业动机的角度来看，自主创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仅仅为自己或者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的“生存型”创业，另外一种是其创办的企业能够成长为

规模相对大的企业，为他人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收入的“机会型”创业（张萃，2018）。

一方面，城市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有“风险平滑”作用，就会激发流动人口创业的动机，当自雇效用比被雇或失业效用高时，人们便会选择自雇，也就是生存型创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能够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从而促使他们去追寻更高的商业满足感，也就是机会型创业。因此，我们提出假说 2：

假说 2：城市的包容度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更高层次的创业行为。

职业选择文献中，影响创业行为的个体变量还包括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个体能力、婚姻状况、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与资产水平，社会网络等（解垚，2012）。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影响创业行为选择，一方面，高学历水平有助于个人获得稳定和高收入的工作，因此降低了个人从事高风险创业活动的动机（陈刚，2015）；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承担的风险更大，因此，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可能更清晰选择稳定低风险的雇员工作，而不是进行创业活动。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个体的管理能力进而更容易进行创业行为。家庭资产水平也会对创业行为选择有正向影响，家庭资产会降低个体的金融约束，从而增加个体的创业选择的概率（Schmalz 等，2017）。社会网络与创业决策是正相关关系。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居住城市的社会网络较弱，从而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周敏慧和陶然，2017）。

城市制度和市场环境也会等宏观因素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市场规模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途径与机会（张萃，2018）。同时，信息化水平是改变商业模式的重要工具。信息化水平越高，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对消费市场的限制，提高创业机会（叶文平等，2018）。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 3：

假说 3：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与创业层次选择存在异质性。城市市场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有促进效应，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自 2009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年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连续断面监测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进行抽样，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 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总样本量约为 16.9 万人。这一数据详细调查了流动主体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服务、子女流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信息。该调查数据经过清洗与城市层面数据匹配后，最终保留的有效样本量为 14.93 万。考虑到这个调查项目在 2016 年 5 月进行的，我们用滞后一年的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

（一）主要变量选取

关于因变量创业的衡量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仅仅为自己或者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的“生存型”创业，另外一种是其创办的企业能够成长为规模相对大的而企业，为他人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收入的“机会型”创业（张萃，2018）。我们以 CMDS 2016 调查问卷中“215 您现在的就业身份属于哪一种？（1.雇员 2.雇主 3.自营劳动者 4.其他）”这一问题为依据，根据研究需要将其进行重新编码，一是创业选择，即是否创业，将“雇员”重新赋值为 0，将“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赋值为 1，其它项做缺失值处理；二是创业层次，将“雇员”赋值为 0，“自营劳动者”赋值为 1，“雇主”赋值为 2，其他值做缺失处理。两个重新编码得出的变量均为有序分类变量，对于创业层次来说，数值越高，创业层次越高；三是创业类型，一个是创建“生存型”创业，将“自营劳动者”赋值为 1，；另一个是“机会型”创业，同理将“雇员”赋值为 0，“雇主”赋值为 1，其他值做缺失处理。

城市包容性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本文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借鉴李叶妍（2017）的研究，从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城市吸引力三个维度，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在社会保障方面，本文没有将全部的“五险一金”纳入指标体系⁶，而仅将允许个人单独缴纳的，具有普惠性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作为衡量指标；在公共服务方面，本文根据公共服务的作用分为民生型公共服务和社区公共服务，分别包括子女在本地入学，补贴性住房，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和是否接受健康教育。此外，本文还从流动人口在该城市的居住时间衡量城市吸引力，进而反映城市包容性，具体指标见表1。根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夏怡然和陆铭，2015；Diamond，2016），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7个指标进行信息浓缩，提取第一主成分得分值作为城市包容性指标⁷。

表 1 城市包容性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载荷量
城市包容性	普惠型社会保障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221
		城镇养老保险	0.272
	民生型公共服务	子女在本地入学	0.035
		补贴性住房	0.074
	社区公共服务	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0.669
		是否接受健康教育	0.641
	城市吸引力	在本地居住的时间	0.105

与现有的职业选择文献一致，我们还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婚姻状态，户籍类型，家庭总人口是指在居住城市的家庭直系亲属人数，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受教育水平用个体受教育的年数来衡量（0=未上过学，6=小学，9=初中，12=高中或中专，15=大专，16=大学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高技能水平为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12年及以上的个体为1，否则为0；由于调查问卷中没有工作经验的相关问题，根据文

⁶ “五险一金”中的“五险”是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是指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由个人缴纳，其余保障必须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按比例缴纳。

⁷ 考虑到篇幅，未汇报主成分分析的碎石图和特征值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献，我们用个体年龄减去其受教育年数再减去 6，作为工作经验变量的度量；时薪是受访者月工资收入与工作时长计算得到；是否购房是指受访者是否在居住地购买房子，包括私人住房、自建房或者经济适用房；家庭月收入是受访者家庭过去一年每月平均月收入；家庭资产指家庭已够房产的总数。

参照文献的做法（张萃，2018），我们还控制了城市的制度环境和信息化水平。制度环境用市场化水平来衡量，指城市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与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值。信息化水平是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第一主成分。我们还控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失业率，金融环境以及开放程度。

表 2 为主要变量的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14.30 万有效调查样本中，约有 33%个体选择创业，其中 79%为自我雇佣者，也就是生存型创业，其余为机会型创业，共有 10,505 个体。由于城市包容性是上述 7 个二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计算过程已经做了去均值处理，所以其均值为 0。所有调查个体中，约有 51.7%个体为男性，超过 80%个体已婚，约 19%的个体拥有城镇户籍或者为城镇居民。家庭总人数的平均值为 2.84 人；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 10.32 年，即流动人口以初高中学历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调查样本的 16.9%。在家庭资产方面，24.7%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城市购房，流动人口的时薪和流动家庭的月均收入的对数均值分别为 2.80 和 8.68。

表 2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创业	创业=1，雇员=0	149298	0.336	0.472
创业层次	雇主=2，自我经营=1，雇员=0	123524	0.491	0.648
生存型创业	自我经营=1，雇员=0	113019	0.351	0.477
机会型创业	雇主=1，雇员=0	83895	0.125	0.331
解释变量：个体层面				
城市包容性	城市包容性 7 个指标的第一主成分	149298	0.000	1.103
男性	男性=1，女性=0	149298	0.517	0.500
婚姻	已婚或再婚=1，其他=0	149298	0.805	0.396
户籍	城镇户籍=1，其他=0	131457	0.190	0.393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数	149298	2.840	1.093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数	149298	10.320	3.110
高技能	高中及以上学历=1, 否则=0	149298	0.169	0.374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受访者年龄-受教育年份-6, 对数值	147663	2.714	0.742
时薪	受访者时薪（元），对数值	125207	2.803	0.719
购房	在居住地购房=1, 否则=0	149298	0.247	0.431
家庭收入	家庭月收入（元），对数值	149298	8.679	0.536
解释变量：城市层面				
市场化水平	城市 GDP 与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值	147338	7.545	3.670
信息化水平	为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第一主成分	147179	0.281	1.186
人均 GDP	人均 GDP（元），对数值	147338	11.56	0.581
人口规模	城市总人口（万人），对数值	147338	5.510	1.066
工业化	每万人拥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47338	4.535	4.639
失业率	城市失业人数/（城市就业总人口+城市失业人数）	135898	0.076	0.179
金融环境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城市生产总值比值	145313	1.860	0.783
城市开放程度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147338	0.026	0.020
工具变量				
艺术团体数量	2000 年各省（市、区）注册艺术团体数量，对数值	30	4.284	0.735

（二）实证方法

为了检验城市包容性对创业选择和创业层次的影响，本文首先使用标准的 Probit 进行验证。Probit 模型有一个潜变量 y^* ，当 $y^*>0$ 时，是否创业取值 1，否则去 0。潜变量和基准模型的表达式分别如下：

$$y_{ij}^* = \beta_0 + \beta_1 inclusive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City_j + I_d + \theta_r + \rho_h + \varepsilon_{ij}$$

$$\Pr(Y_{ij} = 1) = \Pr(y_{ij}^* > 0) = \Phi(\beta_0 + \beta_1 inclusive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City_j + I_d + \theta_r + \rho_h)$$

（1）

Y_{ij} 是指 j 城市 i 个体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 $inclusive$ 衡量个体在居住城市的享受到的包容性， X 包括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City$ 是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我们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 I ）用来控制行业的创业差异，城市等级虚拟变量（ θ ）是指一二线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城市规模的制度优势。我们还控制了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省（市、区）虚拟变量（ ρ ），以控制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影响。 ε_{ij} 为误差项。

除了受到城市包容性以及可观测的变量，如受教育水平、性别，婚姻状况等变量的影响外，个体的创业选择还受到不可观测变量，如能力水平、风险偏好程度等变量的影响。

个体能力水平越高，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那么从经济上可以允许子女随迁，提高个体在城市享受到的包容性，而能力水平与创业选择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由于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问题，城市包容性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

对于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一方面通过设置更多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来解决，如加入工作经验，受教育水平等变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能力水平，加入流动范围（跨省，省内流动或者市内跨县流动）变量来衡量风险偏好，通常低风险偏好的个体会选择留在距离户籍地较近的地方居住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Qian（2013）认为一个地区的同性恋人口和艺术家数量可以衡量该地区的包容程度。类似地，潘越等（2017）采用分地区单位人口拥有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衡量地区的包容程度。参照上述文献的做法，我们采用 2000 年分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作为城市包容性的工具变量。艺术表演是较为独特的团体，人们敢于接受这一独特的职业说明其自身和周围环境对特殊事务的接受和包容程度较高。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越高，该城市的包容性越强，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另外，一个地区 2000 年的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与 2016 年劳动力个体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的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选用 IV Probit 进行回归：

$$y_{ij}^* = \beta_0 + \beta_1 \widehat{inclusive}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City_j + I_d + \theta_r + \rho_h + u_{ij} \quad (2)$$

$$inclusive_{ij} = a_0 + a_1 Art_{jp} + a_2 X_{ij} + a_3 City_j + I_d + \theta_r + \rho_h + v_{ij} \quad (3)$$

$$\Pr(Y_{ij} = 1) = \Pr(y_{ij}^* > 0) \quad (4)$$

Art_j 表示 j 城市所在省（市、区）艺术表演团体数量⁷， v_{ij} 是误差项，其他变量同（1）式。

同时，高能力的劳动力可能是正向选择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能力的个体可能会选择流向竞争激烈，市场开放的东部地区，而这些城市开放的市场环境提高了创业选择的概率

（张萃，2018）。类似的，不同社会网络的劳动力也可能存在负向选择性偏误问题。社会网络对个体的创业行为有正向影响（王春超和冯大威，2018），而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小，比如在户籍市内流动、户籍省内流动，可以继续维持原有的强社会网络，所以相对于选择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流动的可能倾向于依靠其强社会网络进行创业，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范围的选择，可能是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存在选择性偏差影响估计的一致性。

因此，我们通过 Heckman 两步法与工具变量法结合来解决（Heckman, 1974）。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用 Probit 分析流动人口选择流动范围（选择本市流动、省内流动、向东部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并选用加入到回归方程中，计算出每一个观测值的逆 Mills 比率。在这一步回归中，本文将父母的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第二步，利用在同一流动范围的子样本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同时把逆

Mills 比率放入到回归方程中以获得一致估计量。具体回归由（5）—（8）式组成：

$$y_{ij}^* = \beta_0 + \beta_1 \widehat{inclusive}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City_j + \beta_4 \widehat{\lambda} da_{ij} + I_d + \theta_r + \rho_h + u_{ij} \quad (5)$$

$$Move_{ij} = \gamma_0 + \gamma_1 M_{ij} + \gamma_2 Art_{jp} + \gamma_3 X_{ij} + I_d + \theta_r + \rho_h + \varphi_{ij} \quad (6)$$

$$inclusive_{ij} = \alpha_0 + \alpha_1 Art_{jp} + \alpha_2 X_{ij} + \alpha_3 City_j + \alpha_4 \widehat{\lambda} da_{ij} + I_d + \theta_r + \rho_h + v_{ij} \quad (7)$$

$$\Pr(Y_{ij} = 1) = \Pr(y_{ij}^* > 0) \quad (8)$$

（5）式中的 $\widehat{\lambda} da_{ij}$ 就是逆 Mills 比率， ψ 为误差项；（6）式中 Move 为个体选择的二元流动范围（是否在市流动、省内流动、向东部城市流动），M 为父母是否有外出务

⁷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1》。我们尝试寻找地级市层面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及相关统计指标，遗憾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1》及相关年鉴没有提供该统计值。

工/经商经历。

四、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是否创业是二元选择变量，我们先汇报 Probit 模型和 IV Probit 结果，检验城市包容性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也就是假说 1。进一步地，我们再检验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假说 2。为了控制选择性偏误问题，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用 IV-Heckman 方法，以获得一致性的估值。

（一）基本回归结果

在分析基本回归结果之前，我们先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以确保工具变量法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表 3 是 2SLS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由于创业决策也受到地域差异的影响，形成晋商，浙商等创业传统，样本间可能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将误差项聚类到户籍省内，以克服地域内职业观念的相关性。表 3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各地艺术表演团体数量与城市包容性是显著正相关，当地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越多，人们对于特殊事物的接受程度越高，城市的包容性也越高。第一阶段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为 37.822，远大于经验标准值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表 3 的第 2 列和第 3 列分别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为第二阶段被解释变量，结果与第 1 列类似，也就是说，艺术表演团体数量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

表 3	城市包容性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		
	是否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第一阶段被解释变量：城市包容性			
艺术表演团体数量	0.032*** (6.15)	0.033*** (6.00)	0.051*** (7.44)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37.960	36.157	55.824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5.384	33.607	52.607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	37.822	36.021	55.344
估计方法	2SLS	2SLS	2SLS
观测值	105506	93697	66952

R ²	0.468	0.422	0.317
----------------	-------	-------	-------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 4 城市包容性综合指标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第 1 列只包括了城市包容性指标，Probit 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是-0.011，在 1%的水平上显著。显然，个体差异性以及城市宏观环境会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创业决策。第(3)列控制了个人和城市层面的可观测变量，Probit 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依然是负向影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如劳动力的能力水平和风险偏好，共同影响其创业决策。第 5 列的估计值是以各地艺术团体数量为工具变量的 IV Probit 两阶段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是 1.765，在 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控制了由于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城市包容性越高，劳动力选择自主创业的概率就越大，假说 1 成立。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城市包容性每提高一个单位，流动人口在该城市创业的概率就提高 5.84%。2016 年流动人口的总规模为 2.45 亿人⁸，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均值为 0.336，且雇员的平均时薪为 21 元/小时，自主创业个体的平均时薪为 24 元/小时。那么，城市包容性每提高 1%，选择创业的人口就会增加 1431 万人，相应地这些创业人口的年收入就会增加 6010 元/人⁹。可见，提高城市包容性，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同时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如何解释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正向影响呢？城市包容性高，意味着流动人口能够在本地获得与本地户籍居民较为相近或同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一方面，流动人口能够在居住城市立足，后顾之忧得以解决，因此，其选择创业的概率便提高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能够从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中获得归属感和融入感，从而促进

⁸ 见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⁹ 本数据中流动人口的周工作时间为 55 小时/周，根据陈云松（2012），我们假设创业的流动人口的年工作日为 255 日，即 36.4 周，那么与雇员相比，创业人口增加的年收入=（24-21）×55×36.4=6010 元/人。

其追求更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创业的概率。

表 4 的第 3 列除了反映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外，还表明男性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概率显著高于女性，且家庭的人口越多，其创业的概率越大，家庭月收入越高，创业的概率也越大，但是家庭收入与创业选择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不作进一步讨论。此外，已婚，城镇户籍和受教育程度对创业选择是负向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低风险偏好的影响外，城镇户籍和高学历劳动力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高报酬、高保障的职位，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创业动机，这与王春超和冯大威（2018）的结论一致。同时，已经在本地购房降低了流动人口在本地创业的概率。

表 4 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						
	回归系数 (1)	边际效应 (2)	回归系数 (3)	边际效应 (4)	回归系数 (5)	边际效应 (6)
城市包容性	-0.011*** (-3.53)	0.989*** (-3.53)	-0.060*** (-13.32)	0.941*** (-13.32)	1.765*** (3.78)	5.842*** (3.78)
男性			0.241*** (23.92)	1.273*** (23.92)	0.434*** (8.42)	1.543*** (8.42)
婚姻			0.074*** (3.11)	1.077*** (3.11)	-0.145** (-2.17)	0.865** (-2.17)
户籍			-0.189*** (-13.78)	0.828*** (-13.78)	-0.338*** (-7.73)	0.713*** (-7.73)
家庭规模			0.166*** (24.12)	1.181*** (24.12)	0.139*** (10.54)	1.149*** (10.54)
受教育水平			-0.045*** (-19.85)	0.956*** (-19.85)	-0.129*** (-5.93)	0.879*** (-5.93)
工作经验			0.200*** (18.72)	1.221*** (18.72)	0.054 (1.34)	1.055 (1.34)
时薪			0.070*** (8.77)	1.072*** (8.77)	0.038** (2.54)	1.038** (2.54)
是否已购房			-0.011 (-0.92)	0.989 (-0.92)	-0.360*** (-3.93)	0.697*** (-3.93)
家庭收入			0.443*** (37.22)	1.558*** (37.22)	0.362*** (13.06)	1.436*** (13.06)
城市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行业-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估计方法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观测值	149298		97311		97311	
pseudo R ²	0.342					

我们进一步分析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层次的影响。雇员的创业层次取值为 0，自我经营的流动人口取值 1，雇主则取值 2，表 5 的第 1 列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城市包容

性越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也越高。进一步地，我们再区分城市包容性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表 5 第 2 列是城市包容性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城市包容性每提高 1%，流动人口选择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就提高 11.503%。相比之下，城市包容性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且边际效应为 12.767，即城市包容性每提高 1%，流动人口选择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就大大提高到 12.767%。相比之下，机会型创业更需要更多的城市包容性以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这是因为，相对于无可奈何而为之的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所需要投入的资源更大，风险更高。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城市包容性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创业，高城市包容性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

表 5 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层次的影响

	创业层次 回归系数 (1)	生存型创业 回归系数 (2)	边际效应 (3)	机会型创业 回归系数 (4)	边际效应 (5)
城市包容性	0.448*** (2.79)	2.443*** (3.88)	11.503*** (3.88)	2.547*** (3.14)	12.767*** (3.14)
男性	0.124*** (7.76)	0.507*** (7.51)	1.660*** (7.51)	0.473*** (5.71)	1.605*** (5.71)
婚姻	-0.037 (-1.62)	-0.261*** (-2.60)	0.771*** (-2.60)	-0.278** (-2.02)	0.757** (-2.02)
户籍	-0.095*** (-6.39)	-0.432*** (-7.04)	0.649*** (-7.04)	-0.378*** (-4.27)	0.685*** (-4.27)
家庭规模	0.050*** (12.93)	0.143*** (8.65)	1.153*** (8.65)	0.101*** (3.83)	1.107*** (3.83)
受教育水平	-0.036*** (-4.32)	-0.172*** (-5.77)	0.842*** (-5.77)	-0.151*** (-3.74)	0.860*** (-3.74)
工作经验	0.028** (2.06)	-0.004 (-0.08)	0.996 (-0.08)	0.056 (0.90)	1.058 (0.90)
时薪	0.064*** (13.94)	-0.093*** (-3.72)	0.911*** (-3.72)	0.198*** (4.82)	1.219*** (4.82)
是否已购房	-0.089** (-2.19)	-0.594*** (-4.44)	0.552*** (-4.44)	-0.410** (-2.41)	0.664** (-2.41)
家庭收入	0.173*** (27.60)	0.188*** (4.54)	1.206*** (4.54)	0.736*** (21.35)	2.087*** (21.35)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估计方法	IV 2SLS	IV Probit		IV Probit	
观测值	103806	86587		61677	

（二）克服选择性偏差后的创业决策

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指出，选择不同流动区域的劳动力往往具有不同的能力特征和社会网络，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因此，我们使用 IV-Heckman 方法，以克服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造成的估计偏差，主要考虑选择流向东部城市，本省流动和市内流动的选择性偏差，估计结果见表 6。第（1）列是选择跨省流向东部城市的劳动力，lambda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流向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选择流动东部地区创业的流动人口确实是受到遗漏能力变量的影响而进行正向选择的结果。克服了遗漏能力变量造成的正向选择偏差后，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决策的影响从 1.765 下降到 0.759，且保持在 1%水平上显著。如何解释城市包容性的 IV-Heckman 估计值比 IV-Probit 估计值小？相对于其他城市，东部城市的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同时流动人口规模大，市场竞争激烈，选择在这些城市创业，通常面临较多竞争，只有本身能力较强的群体才会考虑这一选择。而个人能力强也直接促进了这些人的创业选择，因此降低了对城市包容性“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

表 6	控制流动地区选择偏差后的回归系数		
	是否创业 (1)	是否创业 (2)	是否创业 (3)
城市包容性	0.759*** (3.69)	0.119* (1.96)	0.480*** (3.17)
男性	0.293*** (10.00)	0.305*** (14.47)	0.324*** (10.30)
婚姻	0.147*** (2.76)	0.133*** (3.74)	0.016 (0.26)
户籍	-0.269*** (-9.38)	-0.270*** (-9.98)	-0.194*** (-5.51)
家庭规模	0.224*** (18.12)	0.115*** (9.53)	0.152*** (8.40)
受教育水平	-0.104*** (-8.22)	-0.017*** (-2.58)	-0.049*** (-5.76)
工作经验	0.083*** (2.83)	0.272*** (15.41)	0.223*** (7.49)
时薪	0.162*** (5.87)	-0.146*** (-4.44)	0.059*** (2.66)
是否已购房	-0.152*** (-3.31)	-0.033 (-1.36)	-0.065** (-2.04)
家庭收入	0.377*** (17.71)	0.504*** (27.40)	0.467*** (13.44)
流动地区 lambda	流向东部城市 0.926*** (4.80)	省内流动 1.190*** (5.94)	市内流动 -0.069 (-1.07)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估计方法	IV-Heckman	IV-Heckman	IV-Heckman
观测值	52912	50357	17147

表 6 第（2）列是选择在户籍省内流动的劳动力， λ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选择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创业的流动人口可能是受到遗漏社会网络变量的影响而进行正向选择的结果。克服了选择性偏差后，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系数从 2.169 下降到 0.119，但仅在 10% 水平上显著。流动人口在进行创业决策前，会仔细评估创业所在市场的潜力以及潜在的社会网络对其创业提供的帮助，因此也降低了创业行为对城市包容性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第 3 列是选择在户籍市内流动的劳动力， λ 系数不显著，说明与选择户籍省内的跨市流动的劳动力相比，选择在市内跨县流动的劳动力的创业决策不存在选择性偏差。

综上，个体能力更强的劳动力正向选择流向市场机制完善的东部地区进行创业。如果积极改善本地市场环境，那么个人能力强的劳动力就会留在本地进行创业，同时可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提高创业概率，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的经济氛围，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创业者的收入。

五、进一步的拓展分析

（一）城市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

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不仅仅影响创业机会，同时影响创业所承担的潜在风险。城市包容性也是城市外部环境之一，除此之外，完备的市场化水平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实现途径和激励机制（张萃，2018），但是，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也意味着激烈的市场经济，提高了创业的进入门槛。信息化水平一方面可以提高城市集聚效应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高度信息化水平可以消除地理空间

对消费市场的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叶文平等，2018）。由此，我们进一步考虑城市外部环境，也就是市场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调节效应。

表 7 第（1）列 – 第（3）列主要考察了城市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第（1）列的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高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完善的市场化水平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实现途径和激励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个体创业选择。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考察市场化水平对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调节效应，结论与第（1）类类似，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给定城市高市场化水平下，城市包容性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创业。城市包容性的“风险平滑效应”促进了劳动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进行创业。表 7 的第（4）列 – 第（6）列汇报了城市信息化水平的调节效应。信息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的影响也有正向调节效应，高信息化水平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供了创业激励，因此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 7	城市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					
	是否创业	生存型 创业	机会型 创业	是否创业	生存型 创业	机会型 创业
	(1)	(2)	(3)	(4)	(5)	(6)
城市包容性	-0.913*** (-2.84)	-0.726** (-2.16)	-0.571 (-1.03)	0.196 (0.80)	0.165 (0.60)	-1.268** (-2.29)
城市包容性×市场化水平	0.153*** (3.96)	0.146*** (3.38)	0.142* (1.81)			
市场化水平	-0.445*** (-3.82)	-0.427*** (-3.27)	-0.406* (-1.70)			
城市包容性×信息化水平				0.398*** (4.04)	0.434*** (4.24)	1.035*** (3.96)
信息化水平				-1.251*** (-4.02)	-1.362*** (-4.24)	-3.230*** (-3.92)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估计方法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观测值	105632	94089	67000	105497	93956	66944

（二）创业者个体异质性的影响

在关于创业行为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外，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差别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与家庭资产等因素。表 8 汇报了流动人口学历水平和家庭资产的异质性影响。第（1）列 – 第（3）列结果表明，高学历水平与城市包容性的交互系数正，但是仅在生存型创业的回归结果中（第 2 列）保持 10% 的显著水平，说明高学历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决策的影响没有显著影响。高学历水平通常意味着较高的个人能力，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中通常可以得到较好的工作计划，因此降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创业选择。第（4）列 – 第（6）列是考虑家庭资产的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资产与城市包容性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也就是高家庭资产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行为有负向调节效应，但是家庭资产的系数显著为正。流动人口在进行创业决策时，若有一定的家庭财富做支撑，一方面有了更高的物质财富资本，为创业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了创业者对城市包容性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特别地，家庭资产显著影响劳动力的机会型创业决策，这是因为相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机会型创业的投入成本较大，更依赖家庭财富的支持。

表 8

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是否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是否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1)	(2)	(3)	(4)	(5)	(6)
城市包容性	1.527*** (2.80)	1.268** (2.13)	1.568*** (2.88)	1.615*** (4.53)	2.689** (2.00)	3.325** (2.28)
城市包容性×高学历	0.572 (0.83)	1.332* (1.86)	0.971 (1.40)			
高学历	-2.219 (-0.97)	-4.800** (-2.01)	-3.555 (-1.52)			
城市包容性×高家庭资产				-1.808*** (-2.77)	-3.316 (-1.64)	-8.642** (-2.03)
高家庭资产				5.571*** (2.68)	10.278 (1.61)	28.121** (2.02)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估计方法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观测值	110204	99141	73626	110204	99141	73626

六、结论

本文运用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个人层面构建城市包容性综合指标，以分析城市包容性能否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得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和启示：

第一，城市包容性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并且有助于提高其创业层次。本文用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发现城市包容性每提高 1%，选择创业的人口就会增加 1431 万人，相应地这些创业人口的年收入就会增加 6010 元/人。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准市民化”待遇，完善政府“无差别化”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同时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第二，城市外部环境对城市包容性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有调节作用。具体地，高市场化水平和高信息化水平均可以正向调节城市包容性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城市包容性的“风险平滑效应”促进了劳动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进行创业。而家庭资产负向调节了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是因为更多的家庭财富为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不同流动区域的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存在选择性偏差。克服选择性偏差后，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保持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如果当地政府积极改善本地市场环境，活跃商业活动，那么个人能力强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进行创业，同时可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提高创业概率，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的经济氛围，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创业者的收入。

参考文献

- [1].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07期。
- [2]. 陈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5年年第05期。
- [3]. 陈云松:《农民工收入与村庄网络:基于多重模型识别策略的因果效应分析》,《社会》,2012年第04期。
- [4]. 解垚:《中国非农自雇活动的转换进入分析》,《经济研究》,2012年第02期。
- [5]. 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 [6]. 李叶妍:《中国城市包容度,流动人口与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7]. 罗明忠、邹佳瑜:《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08期。
- [8]. 宁光杰、段乐乐:《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01期。
- [9]. 潘越、肖金利、戴亦一:《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金融研究》2017年第10期。
- [10]. 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006年第03期。
- [11].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 [12]. 王春超、冯大威:《中国乡—城移民创业行为的决定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网的分析视角》,《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01期。
- [13].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02期。
- [14]. 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经济研究》,2018年第06期。
- [15]. 张萃:《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07期。
- [16]. 张明斗、王雅莉:《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06期。
- [17]. 郑杭生、陆益龙:《开放,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大转型大流动时期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学海》,2011年第06期。
- [18]. 周广肃、李力行:《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世界经济》,2016年第11期。
- [19]. 周敏慧、陶然:《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 [20]. 周颖刚、蒙莉娜、卢琪:《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09期。
- [21]. Diamond, R.,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6, No.3, 2016, pp.479-524.
- [22]. Florida, R. & Gates, G., Technology and Tolerance: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to High-Technology Growth.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echnology-and-tolerance-the-importance-of-diversity-to-high-technology-growth/>, 2003.
- [23]. Glaeser, E. L., Kerr, S. P. & Kerr, W. R.,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7, No.2, 2015, pp.498-520.
- [24]. Heckman, J., Shadow Prices, Market Wages, and Labor Supply, Econometrica, Vol.42, No.4, 1974, pp.679-694.
- [25]. Qian, H.,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 Urban Studies, Vol.50, No.13, 2013, pp.2718-2735.
- [26]. Schmalz, M. C., Sraer, D. A. & Thesmar, D., Housing Collateral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1372, No.1, 2017, pp.99-132.

Urban Inclusive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on Migrants

ZHOU Yinggang, MENG Lina, LIN Xueping

Abstrac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allows surplus labor migrants across sectors and regions, which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Urban inclusiveness, especially the urban inclusiveness to the migrant labor, is one of new engines of economic growth. Using the 2016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dataset, we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rban inclusiveness on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We find that urban inclusiveness encourage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choice. The more urban inclusiveness service that individual received, the bigger entrepreneur he/she choose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rketability and informatization levels also affect the effect of urban inclusiveness on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choice. Consisted of the literature, we also find that household wealth positive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urban inclusiveness on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 Urban Inclusiveness,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STITUTE OF RUC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文化大厦 605 室，100872 电话：010-62516755 邮箱：imi@ruc.edu.cn